

中国近代教育史

编 著
◎ 孙丽荣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教育史

孙丽荣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教育史/孙丽荣编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6

ISBN 978-7-207-08220-6

I. 中… II. 孙… III. 教育史-中国-近代 IV. G5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5151 号

责任编辑:徐 冲

装帧设计:张 涛

中国近代教育史

Zhongguo Jindai Jiaoyu Shi

孙丽荣 编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天兴速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220-6/K · 973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前 言

20 世纪初,中国近代学制的颁定和实施,把教育史纳入大学学堂及师范课堂的课程教学体系之中,从而使教育史学科在制度上得以确立。一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教育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教育史学科建设已获得丰饶的成果,人们对中外教育历史的认识也渐趋深入。其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教育史研究曾出现过两次高潮时期。即 20 世纪 20 年代初至抗战爆发,以及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的 20 多年。其中,“第二个高潮”要远甚于第一个高潮。特别是近 20 年来,由于教育史学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坚持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向;在广泛吸收、充分利用国内外教育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取得了若干重大进展并涌现出一批重要成果。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教育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教育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 20 世纪初才出现。19 世纪后半叶,在“西学东渐”潮流的推动下西方近代学科分类观念的引进和教育制度的导入,为教育史学科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教育史学科建设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在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和困难。这就是需要教育史学工作者,做出不懈努力,使其更加完善、系统和规范。

《中国近代教育史》一书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编著而成的。全书由冯少舟教授统稿并主审。本书不论从体例的设计上,还是从章节与纲目的确定上,都立足于尊重历史、方便学习的指导思想。通过对此书的学习,能够使受教育者了解我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源流,它将有助于树立唯物辩证的教育发展观,扩大教育知识眼界和激励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

本书的编著虽作了多方考虑,但是不论在结构的编排上,还是史实的汇集上都不可必免地会出现错误。敬请读者校正。

编 者

2009年5月 哈尔滨

69/第一节 民国初期教育方针

75/第二节 壬子癸导学制

81/第三节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99/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教育

99/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

110/第二节 20 年代的教育思潮

131/第三节 1922 年的“新学制”

138/第六章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

165/第七章 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165/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方针与政策

176/第二节 学校教育

186/第三节 教育管理

192/参考文献

194/后记

1/前言

1/第一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教育

2/第一节 封建社会末期教育衰败

4/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教育

10/第三节 经世致用教育思潮

14/第二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

14/第一节 传教士活动与早期教会学校

16/第二节 教会教育的发展

21/第三节 洋务教育思潮

24/第四节 新型学校与留学教育

37/第三章 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

37/第一节 改良教育的推进

57/第二节 维新运动教育的特征

69/第四章 民国成立初期的教育

第一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教育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这时候,政治上统治更加黑暗腐朽,贪官污吏盛行,经济上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军事上也日渐虚弱、难以抗侮。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会党广泛发展。在相当一部分工业部门,资本主义萌芽已突破了明清之际的水平,并正在瓦解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由于汉学、理学的脱离实际,这时期的封建教育也空疏腐化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国际帝国主义正试图瓜分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古老而封闭的大门,中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此同时,世界上先进的科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与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不断促进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封建主义国家向近代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演变。

教育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变革历程中,始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第一节 封建社会末期教育衰败

由于缺乏对外文化教育交流,自身也不注重变革,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教育依然保持着传统封建教育的特点。

一、清代后期教育的腐败

自乾嘉以来,清代教育基本为理学和汉学所左右。就学校教育 and 科举制度而言,理学为教学的依据和考试的准则。清朝统治者树理学为儒学正宗,以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因此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发行全国,学校教材也不外“四书”、“五经”之类。为了使理学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统治者不断加强朱熹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中的权威性,称其思想是“大中至正”,“立亿万世一定之归”,致使人们“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科举则以程朱理学为弃取标准,以“四书”为考试范围,又以八股文和小楷为制义格式,趋迫知识阶层沉溺于儒经章句,泯灭自我的创新精神去为“圣贤立言”。

就民间的学术风气而言,汉学已由清初的经世之学蜕变为乾嘉以后的考据之学。在清代统治者的威逼利诱、封建社会的渐趋安定和学术界治经路途的内在制约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下,汉学家“遂将主要精力倾注于与世无争的考证、训诂,诠释、校勘古典经籍”之中,学者们不问政事,沉湎故纸,为学术而学术,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

二、清代学者的革新主张

在理学和汉学统治教育界、学术界之际,已有学者起而对此加以批判。戴震针对程朱“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指出“理即人情”,肯定“理存乎欲”。他说:“成其气类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质”,可见“气”、“性”、“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舍弃才质,就无所谓“性”,因为“才质者,性之所呈也”,他强调人们“成性各殊”,所以“才质亦殊”。这已经初露尊重个性和崇尚才质的端倪,与理学教育的基本精神截然相反。章学诚进一步主张“因性施教”,认为“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治学贵在“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要,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如果不依据自己的“天质”、“心性”,一味逐风气、敢时髦,这就是“伪”。治学“入于伪”的原因就在于“毁誉重而名心亟”。在学问上若想有所自树,就要有不为毁誉所倾、不顾风气所侵的胆略。

为了纠正当时学风之弊,焦循提倡“性灵”和“通变”。他认为,经学就是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这不仅仅要拆毁汉、宋两家的壁垒,还要打通一切学问,并且以治学者自我的“性灵”赋学问以生命:“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焦循认为,教育的正途既应重视“学”又应关注“思”,前者即“证之以实”,后者即“运之于虚”,只有“学”与“思”、“实”与“虚”的结合,才是真正的“学之道”。从这一角度出发,他认为“考据”之名“学”是习非成是的错误。由于当时学风的弊端更集中于“学而不思”,所以焦循更强调“思”的重要,他倡言“无性灵

不可以言经学”主张“变通人性”的实质是企图使教育改变既成的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教育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运动。它不仅猛烈冲击了清王朝的封建政治和经济秩序,在文化教育领域也引起强烈的震撼。

一、太平天国的教育活动与主张

继经世致用教育思潮而起的太平天国教育,从另一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及其教育近代化作了探索。

中国近代历史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人民的觉醒而开始的,所以中国人对近代化的追求始终必须面对世界。林则徐、魏源借助的是西方的军事技术,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借助的是西方的宗教思想。

(一)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目标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目标是推翻清皇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为了配合这一革命的中心任务,在教育方面必须摧毁维护这一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反对封建社会儒家的传统教育思想。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名分等级制度,为反对这一教育价值观念,洪秀全援引西方基督教的平等精神为武器,仿效基督教教会建立“拜上帝会”这一宗教组织,又吸收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和农民阶级朴素的平均主义观念,创立新的教义。为了用宗教思想宣传革命、教育人民,洪秀全写成了《天条书》、《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一系列

宗教、政治读本。这些书宣传“天父上帝人人共”、“普天之下皆兄弟”，谴责相凌、相斗、相夺、相杀的旧世界，歌颂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世界，提出了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社会，号召人们坚定地站在以“皇上帝”为代表的正义力量一边，共同击灭“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即清朝皇帝、封建官吏及地主阶级。这实质上是一种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在当时具有否定封建等级制度、宣传政治平等的现实意义，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的勇气。

（二）以革命教育取代传统教育

太平天国为了以革命教育取代传统教育，实行了激烈的反儒政策。早在太平军起义前，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就在其任教的私塾中捣毁孔子牌位，以示与旧教育彻底决裂。洪秀全为了解除儒家纲常名教对农民的思想束缚，编造了一则孔子因“教人之书多错”遂受皇上追究以致被责打和受罚的故事，使孔子从“大成至圣先师”的神圣地位跌落到罪人，以动摇孔子和儒家在人们心目中的独尊地位。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后，凡太平军所至之处孔庙、偶像悉被捣毁，学宫也被改为仓库、马房或屠宰场，“四书”、“五经”被列为“妖书邪说”，儒家书籍被禁，凡藏书者一律治罪。明文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孔孟诸子之书被“尽行焚除”，出现了“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场面。

在废除儒家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太平天国设以其宗教教义和方针政策、军纪法规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如由洪秀全、冯云山亲自制定的《天条书》既是“拜上帝会”的教义和守则，又是太平天国教育的主要内容。其内容包括宗教仪式和十款

天条两部分。凡会员入会须经受洗、朝起、夜睡、食饭、七日礼拜等一系列宗教仪式。十款天条则规定：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小好起贪心。十款天条也就是“十诫”，是会员平时的行为准则，又是战时的军事纪律，所以务必熟知。《天条书》起初仅抄写传习，太平军起义后开始大量刊行，为太平天国军民必读的课本，人手一册，朝夕诵读，不识字者由识字者负责口授。此外，还有脱胎于基督教《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吸取传统童蒙教材形式但注入革命内容和宗教思想的新式儿童读物，如《三字经》、《御制千字诏》等。

农民起义的首要目标是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忙于行军作战的农民运动领袖也无暇建立正规的新教育制度，他们推广教育的方式常常通过各种宗教活动和仪式来进行。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颁布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其中在教育方面实施了宗教、政治、教育为一体的平等制度，礼拜堂既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又是政教合一的学校。在太平天国管辖区内，儿童每天须去礼拜堂听讲圣书，成年男女则在礼拜日去礼拜堂听讲。除了礼拜堂上学形式，还设置临时性儿童教育机构，如“义学”、“育才馆”、“育才学校”等。另有一种“带徒弟”的教育形式，即以太平天国官员随身带童子一人或数人的办法，使儿童通过实践学习宗教、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知识。太平天国重视女子教育，这是对轻视妇女教育的传统观念的有力冲击，通过宗教教育，不少女子又成为热心的宗教宣讲师。太平天国所推行的宗教化、社

会化的教育、使男女老幼、贫富尊卑都能平等受教,从而废除了传统的等级教育制度。

(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

太平天国以宗教教育为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有力地发动了广大民众参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运动。但是,以宗教权威取代儒学权威难以为中国人民指明通向近代化的光明坦途,终究不能成为战胜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法宝。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化进行暴风骤雨般的扫荡,是出于革命策略的需要,固然有其现实性,但粗暴地对待传统文化,不仅缺乏科学精神,也容易授人以柄,尤其难于得到知识阶层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面临新的斗争形势,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反孔形式也有所变化,即采取了删改儒家经典的方式,先前被视作“妖书”的“四书”、“五经”,此时也得以“删改准阅”。1861年颁布的《钦定士阶条例》更称:“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者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士果备而习焉,则焕乎有文,斐然成章。”这似乎表明后期太平天国革命在斗争策略上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代表农业小生产方式的农民阶级要真正超脱传统教育模式和精神力量的制约是困难的。

二、一种新的教育理想的形成

与充满空想色彩的大同社会理想画卷《天朝田亩制度》不同,太平天国后期领袖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展示了一幅渴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及教育的蓝图,显示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探索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新动向。

洪仁玕是中国近代富有世界知识的先驱。他熟习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和科学文化,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和世界发展的趋势,因势利导地提出各项改革主张,并拟定了振兴太平天国的纲领《资政新篇》。他从“治国必先立政,为政必有取资”的理论基础出发,主张“学习邦法”和“大兴政教”。前者指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等近代制度,后者指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建立相应的新教育文化体制,其实质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

洪仁玕列举英、美、法、德、俄等国的事例,论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革新政教的重要性,并展示国家近代化须走的道路和压循的方法,主张迅速兴办近代交通运输业,提倡机器生产,开矿、立厂、办银行,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为建立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他特别强调“教法兼行”的作用,认为凡有关世道人心、纲常伦理、教养大典均须以立法为准绳。只要“立法善而施法广,积时久而持法严”,就能达到“代有贤者以相维持,民自固结而不可解,天下永垂而不朽”。在立法之际还应配以宣传教育,通过新闻媒介,对上起监督、取资之效,对下收劝励、教化之功,如此,“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教育与法制相辅相成,就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

洪仁玕提倡设“士民公会”,以拯困扶危,办理教育,鼓励人们兴学馆、办医院,以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他建议“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以便“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还可以奖善罚恶,教育民众。这些都显示出按照近代资本主义体制改造中国教育的努力。1896年容闳向洪仁玕所提改革建

议中,涉及教育的就有建立武备学校和海军学校及各类实业学校,颁布各级学校制度等,这些主张因接近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所以都得到洪仁玕的赞赏。

洪仁玕所主张的教育内容也已突破传统教育的图囿,趋向西方的科学技术。他反对浮文,注重实学,认为徒事空谈、虚妄不实的学风无益于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要求教育引导人们“弃伪从真,去浮存实”,读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为国家献策出力,实用之人才有利于建设“新天新地新世界”。他针对当时“不务实学,专写浮文”的不良学风,要求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加以匡正和改造。他认为,代表西方科技文化的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都是“正堂堂之技”,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他以俄罗斯、日本、暹罗诸国由于学习西方科技文化而致富强为例,来证明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只有推广科技文化,才能“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内鼓励人们发明创造以及学习科技、招徒传授,对外主张在不干涉国政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人来我国传授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

不难看出,《资政新篇》的教育理念一方面继承了清以来实学教育思潮的经世致用精神,另一方面又汲取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尤其是科技文化)的因素,在中国教育近代化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只是由于当时严峻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形势,使《资政新篇》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理念只能是一幅美妙的蓝图,而未能付诸实施。

第三节 经世致用教育思潮

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衰朽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潜滋暗长,传统教育的内部已在孕育着变革的因子。当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随着炮火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长驱直入时,封建传统教育的丧钟就正式敲响了。最先不自觉地充当了敲钟人角色的是封建社会知识阶层中的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教育思想,内承乾嘉以来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性因素,外应世界局势的激烈变动,探求着革故鼎新的自强之路,从而促使了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再兴。

一、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复兴

鸦片战争时期的客观形势是古老的封建社会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夜,龚自珍敏感地觉察到社会的大变动正在产生,传统教育所依赖的封建伦常之“体”,愈加不适于变动的“世”,再用它去“经世”,显然难以奏效。至此,传统教育的作用观已经难以统一。龚自珍不再像清初实学教育思想家,抽象地把培养、使用、内外德才合一的人才作为教育的理想目标,而是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命根“经”表示了大胆的怀疑。他认为,“经”适用于三代,“史”有益于汉朝以下,这些都未必适于当今之势。因此他明确指出,当今的教化应根据变动的社会现实来确立“先”、“急”的教育内容。虽然龚自珍尚未明确“先”、“急”的具体内容(这是由稍后时期的魏源完成的),但他的教育思想对儒家传统教育价值观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比之明清之时的实学教育思潮显然迈进了一大步。